

数字经济对中国向东盟出口绩效的影响： 理论机制与模型分析

严 密，林素洁

常州大学商学院，江苏 常州

收稿日期：2026年8月4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30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14日

摘 要

数字经济正在重塑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联系，但其作用于出口绩效的内在机理尚缺乏统一的理论刻画。本文在垄断竞争与异质性企业框架下构建含质量与贸易成本的局部均衡模型，把数字经济的影响分解为贸易成本、质量升级与匹配-扩展边际三条路径，并推导出出口额对数字经济水平的弹性表达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压低双边冰山贸易成本以提升集约边际，降低质量提供成本以推动质量升级，改善供需匹配、削减固定进入成本以扩大扩展边际；三条路径净效应恒为正，且在各渠道弹性不变时，成本效应与质量效应均随替代弹性上升而增强，替代弹性较大的产品对数字经济更敏感。据此提出以数字基础设施互联、跨境电商与数字贸易规则对接、出口质量与韧性培育为重点的政策方向，并讨论了局部均衡设定的局限。

关键词

数字经济，出口绩效，东盟，贸易成本，异质性企业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China's Export Performance to ASEAN: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nd a Model Analysis

Mi Yan, CHIV SUKEAT

School of Business,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August 4,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30,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4, 2026

Abstract

The digital economy is reshaping China-ASEAN trade, yet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it affects

文章引用：严密，林素洁. 数字经济对中国向东盟出口绩效的影响：理论机制与模型分析[J]. 商业全球化, 2026, 14(4): 330-338. DOI: 10.12677/bglo.2026.144032

export performance lack a unified theoretical account. Within a monopolistic-competition and firm-heterogeneity framework, this paper builds a partial-equilibrium model with quality and trade costs, decomposing its effect into three channels—trade cost, quality upgrading, and matching-extensive margin—and derives the elasticity of export value with respect to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digital economy raises the intensive margin by lowering iceberg trade costs, drives quality upgrading by reducing the cost of providing quality, and expands the extensive margin by improving matching and cutting fixed entry costs. The net effect is unambiguously positive, and both effects strengthen as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rises when the channel elasticities are held constant, implying that products with a higher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exhibit greater export responsiveness to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paper proposes policy directions centred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align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digital trade rul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export quality and resilience, and notes the limits of the partial-equilibrium setting.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Export Performance, ASEAN, Trade Costs, Heterogeneous Firm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东盟已连续多年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2024 年, 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总额达到 6.99 万亿元, 同比增长 9.0%, 占同期中国外贸总值的 15.9%¹。贸易规模不断扩张的时候, 支撑双边贸易的基础技术条件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数字技术由交易的外围工具向贸易组织方式的核心转变。2023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53.9 万亿元, 占 GDP 的比重为 42.8%, 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66.45%²; 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 2024 年达 2.63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0.8%³。两条曲线同时上升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数字经济到底通过怎样的途径、以怎样的强度作用于中国对东盟出口绩效。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化联系不是自发形成的, 是有制度、有平台的支撑。2022 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正式生效, 其电子商务专章为跨境数据流动、电子认证、无纸化贸易提供规则依据⁴, 中国 - 东盟信息港、数字丝绸之路等倡议从物理上推进了网络、数据中心、跨境支付系统的互联互通。依靠这些渠道, 越来越多的中国出口企业通过数字平台直接接触东盟买家, 贸易组织方式也由原来的层层中间商变成了平台撮合下的扁平对接。这种改变一方面改变了出口的成本结构, 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出口的参与主体, 使“数字经济怎样影响出口绩效”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变成了现实中的一个问题。

回答这一问题对中国与东盟都有现实意义。东盟内部数字化水平差距悬殊,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数字基础设施较为完善, 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仍处于起步阶段, 数字红利的释放空间与规则、基建对接的现实约束并存。与此同时, 中国对东盟的数字产品贸易并非全面顺差, 部分高附加值环节的逆差长期存在。可见数字经济的出口影响既非单向, 也不均质, 仅凭总量相关难以揭示其结构性后果。中国 - 东盟走廊因而成为观察数字经济出口效应的理想窗口: 双边贸易规模庞大而稳定, 数字化条件高度分化, 结构短板亟待补足。要讲清这些侧面, 仅有现象描述并不足够, 还需一个能区分渠道、刻画方向与强度的理论框架。

¹http://asean.china-mission.gov.cn/chn/stxwx/202501/t20250113_11532245.htm

²http://jxt.zj.gov.cn/art/2024/9/12/art_1657977_58933048.html

³<http://www.news.cn/fortune/20250113/f55022d76631432baa869da6a9a9f114/c.html>

⁴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26/content_5670518.htm

已有研究多以企业或地区面板考察数字经济与出口的经验联系,对“数字经济-出口绩效”的传导机制缺乏统一而清晰的理论表述,针对中国-东盟这一特定走廊的模型化分析亦不多见。本文尝试在此方向上有所补充:在垄断竞争与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建立包含产品质量与贸易成本的局部均衡模型,把数字经济的作用分解为贸易成本、质量升级与匹配-扩展边际三条路径,给出弹性表达式,并讨论其随替代弹性变化的异质性。边际贡献有三:其一,将分散于经验文献的若干机制纳入同一框架,使各渠道的方向与强度可比较、可相加;其二,识别数字经济出口效应的异质性来源,为差异化政策提供逻辑依据;其三,把静态规模效应与外部冲击下的出口韧性联系起来。

2. 文献综述与评述

数字经济与出口绩效的联系是近年国际贸易研究热点,成果大体沿三条线索展开。

第一条线索关注出口质量与结构升级。赖宁菲等(2026) [1]从政策视角发现数字经济政策可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并识别出技术创新与要素配置两种中介效应;王茂光和张建翔(2025) [2]以珠三角城市为对象,认为数字经济通过赋能制造业推动出口结构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高,由此形成“数字化-质量升级-出口绩效”的基本逻辑。第二条线索是边际分解与规模扩张。黄晓敏和梁俊伟(2025) [3]发现数字经济对省级出口的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均有促进;吕美静等(2025) [4]把研究延伸至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提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调节作用;沈和斌和张丹宁(2025) [5]则从不确定性的中介角度分析其促进企业出口扩张的途径。第三条线索转向质量竞争与韧性。马斌和何亚男(2025) [6]分析了贸易摩擦冲击下中国数字产品出口质量的升级路径;张兵和宋超凡(2025) [7]认为数字经济改善要素配置从而提高出口韧性就中国-东盟走廊而言,张远鹏和王超男(2024) [8]指出双边数字产品贸易长期存在巨额逆差,反映出高附加值环节的竞争短板。国际研究更早从成本侧给出解释:Goldfarb and Tucker (2019) [9]梳理了数字技术如何压低搜寻、复制、运输、追踪与验证五类成本;Lendle *et al.* (2016) [10]利用跨境电商交易数据发现在线平台显著削弱了距离对贸易的阻碍。

就理论谱系而言,本文的分析立足于垄断竞争贸易理论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前者认为消费者偏好差异化产品并由此带来规模报酬,产品种类与质量因而成为贸易利益的来源;后者由Melitz (2003) [11]奠定,企业生产率存在差异,只有高于临界值者才选择出口,出口因而同时具有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Chaney (2008) [12]进一步指出替代弹性决定了二元边际对贸易成本变动的相对反应,为本文的异质性推论提供了直接依据。数字经济恰好同时作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降低可变贸易成本影响在位出口者的规模,另一方面通过削减固定进入成本降低新出口企业的进入门槛。已有研究虽已揭示二者的经验联系,但仍存在两点不足:一是机制分散,质量、边际、韧性等渠道分别见于不同文献,尚未形成可统一定义其方向与相对强度的框架;二是对象笼统,多数研究以中国整体或国内地区为样本,对中国-东盟这一存在明显数字化梯度的走廊,模型化的机理分析较少。本文即从这两点入手,用简化的理论模型把上述渠道整合起来,并落到中国对东盟出口绩效这一具体情境。

3. 数字经济影响中国对东盟出口绩效的理论机制

建模之前,先从经济学直觉理清数字经济作用于出口绩效的三条路径,这是模型设定的基础(见表1)。

贸易成本路径。出口绩效很大程度上是由贸易成本的高低决定的。数字技术用电子化通关、在线支付、智能物流和数字平台来压缩信息搜寻、谈判履约和跨境结算的成本。对中国和东盟来说,这条路径意义重大,因为双边市场被海洋和多元制度所分割,涉及十国不同的语言、法律和商业惯例,传统的贸易中存在较多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履约的不确定性。数字平台的介入相当于在两个市场之间架设了一条低摩擦的通道,线上展示代替了线下寻访、电子合同和第三方担保支付降低了履约风险、跨境物流数字化

追踪缩短了 在途时间和不确定性。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省最终都会体现为更低的有效贸易成本，从而提高已有的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扩大出口的集约边际。从数据上也已经体现出来，2024 年中国对东盟出口为 4.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远高于同期中国整体出口增速⁵，在贸易成本随着数字化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集约边际的扩大就更加明显了。

Table 1. Thre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he digital economy affects China’s export performance to ASEAN
表 1. 数字经济影响中国对东盟出口绩效的三条路径

路径	数字化作用载体	模型对应参数	对出口绩效的影响
贸易成本路径	电子通关、在线支付、智能物流	$\tau(D), \tau'(D) < 0$	降低双边贸易成本，扩大出口集约边际
质量升级路径	大数据反馈、数字化设计、柔性制造	$q(D), q'(D) > 0$	降低质量提供成本，推动出口质量升级
匹配 - 扩展边际路径	跨境电商平台、供需匹配	$N(D), N'(D) > 0$	削减固定进入成本，扩大出口扩展边际

注：表中模型对应参数的具体含义见第四节。

质量升级路径。数字经济既改变交易方式，也改变生产方式。大数据与平台用户反馈使出口企业能更准确地识别东盟消费者偏好——不同收入水平、宗教文化与气候条件下的需求差异，过去需长期试错才能掌握，如今可通过平台销售数据迅速捕捉。数字化设计与柔性制造降低了提供高质量、差异化产品的边际成本，使小批量、多品种的定制化出口在经济上变得可行。质量提供成本下降后，企业会在既定价格水平上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从而获得更高的出口收益。这解释了数字化为何往往伴随出口结构从低端代工向中高端品牌转移，也说明数字经济的出口效应不止于“卖得更多”，更在于“卖得更好”。在东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消费者对智能家电、消费电子等中高端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数字渠道恰好为中国出口企业提供了捕捉这一需求、快速调整产品质量的机会。

匹配 - 扩展边际路径。数字平台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匹配。它大大降低了潜在出口者发现海外买家的门槛，过去开拓东盟市场需要依靠参展、设立海外办事处或者寻找当地代理，固定投入巨大，只有规模较大的企业才能承担得起，而跨境电商平台把这些固定投入大幅压缩，使大量本来被挡在门外的中小企业直接参与跨境贸易。根据异质性企业的理论，固定进入成本的降低会降低出口的生产率临界值，使更多以前“有竞争力但进不去”的企业越过出口门槛，进而扩大出口的扩展边际。对于东盟这样一个由许多中小市场组成、单一国别市场容量小、消费分层明显的地方，匹配效率的提高尤为重要，因为它使得面向利基市场的小额、高频出口变得可行。出口主体快速扩张给这一路径提供现实证据，到 2024 年中国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已经超过 12 万家，在海外共注册商标超过 3 万个⁶，许多以前无法承担出海固定成本的小企业，正是借助数字平台第一次走出国门，进入东盟市场。

三条路径在东盟各市场的释放程度并不相同，与成员国所处的数字化阶段密切相关。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数字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市场，贸易成本已然较低，数字经济的边际贡献更多体现为质量升级与品牌溢价；在电商渗透率快速上升的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等市场，匹配 - 扩展边际效应最为活跃；而在数字基建相对薄弱的市场，贸易成本路径仍有可观的下行空间。可见同一数字化举措在不同成员国带动的出口增量并不一致，说明政策讨论须因国施策、分环节推进。

需要指出，三条路径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同一数字化过程在不同侧面的呈现：成本下降、质量提高与匹配改善常常同时发生。跨境电商平台既降低了交易成本，又以用户数据反哺质量改善，同时为中小

⁵http://asean.china-mission.gov.cn/chn/stxwx/202501/t20250113_11532245.htm
⁶<https://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40605/5a419f58c9f34378b95d3034f1c36ca8/c.html>

企业开辟了进入渠道。因此仅凭直觉难以判断三者孰轻孰重，也无法确定合力方向是否必然为正。下一节将把它们纳入统一的局部均衡框架，使各路径的方向与强度可比较、可相加，并给出可检验的命题。

4. 理论模型与命题

4.1. 需求与企业行为

考虑东盟某一进口市场，其代表性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具有不变替代弹性(CES)偏好。设产品种类集合为 Ω ， $x(\omega)$ 为对种类 ω 的消费量， $q(\omega)$ 为其质量， $\sigma > 1$ 为产品间替代弹性，则消费者效用为

$$U = \left[\int_{\Omega} (q(\omega)x(\omega))^{\frac{\sigma-1}{\sigma}} d\omega \right]^{\frac{\sigma}{\sigma-1}} \tag{1}$$

在市场总支出为 Y 、价格指数为 P 的约束下求解效用最大化，可得对中国出口品 ω 的需求函数

$$x(\omega) = q(\omega)^{\sigma-1} p(\omega)^{-\sigma} P^{\sigma-1} Y \tag{2}$$

其中价格指数 $P = \left[\int_{\Omega} q(\omega)^{\sigma-1} p(\omega)^{1-\sigma} d\omega \right]^{\frac{1}{1-\sigma}}$ 。式(2)表明，需求随质量上升而扩张、随到岸价格上升而收缩，且替代弹性 σ 越大，价格的边际作用越强。

中国出口企业以离岸价格 $p_0(\omega)$ 供货，跨境交付需承担“冰山”形式的贸易成本 $\tau \geq 1$ ，即每运出一单位产品仅有 $1/\tau$ 单位到达东盟市场，于是到岸价格为

$$p(\omega) = \tau p_0(\omega), \tau = \tau(D), \tau'(D) < 0 \tag{3}$$

这里把数字经济水平记为 D 。数字经济通过三个渠道进入模型：其一，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即 $\tau = \tau(D)$ 且 $\tau'(D) < 0$ ；其二，降低质量提供成本，从而提升均衡质量，即 $q = q(D)$ 且 $q'(D) > 0$ ；其三，改善供需匹配并削减固定进入成本，使参与出口的企业数目 $N = N(D)$ 且 $N'(D) > 0$ 。模型主要符号及其含义见表 2。

Table 2. Main symbols of the model and their meanings
表 2. 模型主要符号及其含义

符号	含义
σ	产品间替代弹性， $\sigma > 1$
$q(\omega)$	出口品质量
p_0	出口品离岸价格
τ	冰山贸易成本， $\tau \geq 1$
D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Y	东盟进口市场总支出
P	进口市场价格指数
N	出口企业数目
v, V	单个企业出口额、总出口额

注：变量都是正数，质量、企业数目随着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上升，贸易成本也随之降低。

4.2. 单个企业的出口额

以离岸价格计量的单个企业对东盟出口额为 $v = p_0 x$ 。将式(2)与式(3)代入, 整理得

$$v = q^{\sigma-1} \tau^{-\sigma} p_0^{1-\sigma} P^{\sigma-1} Y \tag{4}$$

两边取对数, 得到便于做比较静态分析的对数线性形式

$$\ln v = (\sigma-1)\ln q - \sigma \ln \tau + (1-\sigma)\ln p_0 + (\sigma-1)\ln P + \ln Y \tag{5}$$

在垄断竞争结构下, 企业按对边际成本加成一个不变比例的方式定价, 离岸价格 p_0 由生产成本与加成率决定; 数字经济主要经由贸易成本 τ 、质量 q 与出口企业数目 N 三个渠道发挥作用, 而不通过改变加成率扭曲定价。因此在局部均衡下, 把市场支出 Y 、价格指数 P 与离岸定价 p_0 视为给定, 则单个企业出口额的变动由质量与贸易成本两项驱动, 这一简化既保留了核心机制, 又使比较静态分析得以清晰展开。需要指出, 这一处理也构成本文的主要局限: 市场支出与价格指数被外生给定, 模型因而无法容纳数字化在一般均衡中的价格与福利反馈。

4.3. 总出口额与弹性分解

中国对东盟的总出口额由出口企业数目与单个企业出口额共同决定。记 $\bar{v}$ 为代表性企业的出口额, 则

$$V = N \bar{v}, N = N(D), N'(D) > 0 \tag{6}$$

式(6)中的企业数目函数并非任意设定, 其微观基础在于异质性企业的进入决策: 潜在出口者的生产率服从连续分布, 出口须先支付市场调研、渠道搭建与认证合规等固定进入成本, 只有生产率高于零利润条件所定临界值者才会出口。数字经济以平台撮合替代线下寻访、以标准化接口替代逐一对接, 压低了这笔成本, 出口生产率临界值随之下移, 原本徘徊在门槛之下的企业得以进入, 这正是企业数目随数字经济水平递增的由来。可见扩展边际弹性并不恒定, 而取决于生产率分布在临界值邻域的密度: 门槛附近企业越密集, 同等幅度的固定成本削减所带动的扩展边际扩张就越大。

对式(6)取对数并对 $\ln D$ 求导, 结合式(5), 可得出出口额对数字经济水平的弹性分解式

$$\frac{d \ln V}{d \ln D} = \eta_N + (\sigma-1)\eta_q - \sigma\eta_\tau \tag{7}$$

其中各分项弹性定义为 $\eta_N = \frac{d \ln N}{d \ln D} > 0$ 、 $\eta_q = \frac{d \ln q}{d \ln D} > 0$ 、 $\eta_\tau = \frac{d \ln \tau}{d \ln D} < 0$, 分别刻画数字经济对出口企业数目、出口质量与贸易成本的作用强度。式(7)右端三项依次对应第三节的匹配-扩展边际、质量升级与贸易成本三条路径, 其弹性与符号汇总于表 3。

Table 3. Elasticity decomposition of export value and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表 3. 出口额弹性分解与理论命题

分项	弹性	符号	对应路径	命题
扩展边际	η_N	>0	匹配 - 扩展边际	命题 3
质量升级	$(\sigma-1)\eta_q$	>0	质量升级	命题 2
贸易成本	$-\sigma\eta_\tau$	>0	贸易成本	命题 1
净效应	见式(7)	>0	-	综合

注: 净效应为三条路径之和 $\eta_N + (\sigma-1)\eta_q - \sigma\eta_\tau$, 恒为正, 对应式(8)。

由于 $\eta_\tau < 0$, 有 $-\sigma\eta_\tau > 0$; 又 $\eta_N > 0$ 、 $(\sigma-1)\eta_q > 0$, 故

$$\frac{d \ln V}{d \ln D} > 0 \quad (8)$$

即三条路径上数字经济对中国向东盟出口绩效的净效应都是正的。由此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1 (贸易成本 - 集约边际效应) 数字经济通过降低双边贸易成本提升既有出口品的出口额, 其作用强度为 $-\sigma\eta_\tau > 0$, 且随替代弹性 σ 的增大而增强。

命题 2 (质量升级效应) 数字经济通过降低质量提供成本推动出口质量升级, 从而提高出口额, 其作用强度为 $(\sigma-1)\eta_q > 0$ 。

命题 3 (匹配 - 扩展边际效应) 数字经济通过改善供需匹配、削减固定进入成本扩大出口的扩展边际, 其作用强度为 $\eta_N > 0$ 。

式(7)的分解具有清晰的经济含义: 它把一个看似笼统的“数字经济促进出口”判断, 拆成了可分别识别、可分别度量的三股力量。三者的相对大小取决于产品与市场特征——在贸易成本本就高昂、距离远、制度差异大的市场, 成本项 $-\sigma\eta_\tau$ 可能占主导; 在消费者对品质敏感的中高端市场, 质量项 $(\sigma-1)\eta_q$ 的贡献更突出; 而在以中小企业为主、此前出口参与度较低的部门, 扩展边际项 η_N 往往最为可观。这一结构提示, 评估数字经济的出口效应不能只看一个笼统的总量弹性, 更要看其内部构成, 因为不同构成对应着不同的政策抓手。更重要的是, 这一分解把“数字经济是否促进出口”这一定性判断, 转化为“各条路径各自贡献几何”的定量问题, 为后续以数据识别主导渠道、进而精准施策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接口。

4.4. 异质性推论

进一步考察弹性分解式对替代弹性 σ 的依赖。贸易成本效应 $-\sigma\eta_\tau$ 与质量升级效应 $(\sigma-1)\eta_q$ 均为 σ 的增函数, 即

$$\frac{\partial(-\sigma\eta_\tau)}{\partial\sigma} = -\eta_\tau > 0, \quad \frac{\partial[(\sigma-1)\eta_q]}{\partial\sigma} = \eta_q > 0 \quad (9)$$

这意味着, 在各渠道弹性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替代弹性较大的产品, 其出口绩效对数字经济更为敏感。这一推论反映的是产品可替代性差异, 不能直接等同于产品差异化程度或可数字化程度的差异。在 CES 设定下, 替代弹性越大, 产品之间越容易替代; 高度差异化产品通常对应较低的替代弹性。因此, 具体品类的数字化收益还需结合贸易成本、质量升级与进入门槛的变化判断。由此得到推论。

推论(异质性)在各渠道弹性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数字经济的出口效应在产品之间是不均质的, 替代弹性越高的产品, 其出口绩效对数字经济越敏感。

这一推论为认识中国对东盟出口的结构特点提供了线索: 应结合产品的可替代性和各渠道弹性判断数字化收益, 而不能仅凭差异化程度或可数字化程度作出比较。在高附加值数字产品环节, 单纯依靠降低成本与匹配渠道, 也未必能够扭转竞争劣势。

4.5. 从静态效应到出口韧性

上述弹性分解刻画的是数字经济对出口绩效的静态影响。把视野延伸到外部冲击情境, 三条路径还共同支撑着出口的韧性。设东盟市场遭遇一次负向需求冲击, 使市场总支出由 Y 降至 $(1-\delta)Y$ ($0 < \delta < 1$)。由式(5)可知, 单个企业的出口额与 Y 同比例变动, 冲击会沿集约边际向所有在位出口者传导; 此时出口能否保持稳定, 取决于扩展边际所决定的结构。一方面, 较高的 η_N 意味着出口主体与目的市场更为多元, 单一买家或单一国别市场的局部波动更容易被其他市场对冲, 整体出口的方差因而下降; 另一方面, 较低的贸易成本 τ 抬高了在位企业的利润空间, 使生产率临界值与盈亏平衡点之间留有更大缓冲, 冲击来

临时退出出口的企业更少。可见, 数字经济不仅在平稳期提升出口规模, 也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与边际结构增强了出口在冲击下的抗压能力, 这与既有研究关于数字经济增强出口韧性的判断相互呼应。需要说明的是, 韧性的获得以扩展边际的真实多元化为前提; 若出口高度依赖少数平台或少数头部市场, 匹配效率的提升反而可能放大共同冲击的传导, 这是数字化进程中需要警惕的另一面。因此, 扩展边际的“量”与“质”同等重要: 既要让更多企业进入, 也要让它们分散于更多市场、更多平台与更多结算方式之上。从这个角度看, 数字经济与出口韧性之间并非简单的单调关系, 而取决于数字化红利是否真正转化为出口结构的多元化; 韧性并非数字化的自动产物, 而需要政策有意识地加以引导。

5. 政策启示

依据上述机理与模型分析, 可从四个方面把数字经济的出口潜力转化为可持续的出口绩效。

第一, 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压低贸易成本路径上的摩擦。贸易成本效应是数字经济出口红利中见效最快的一环, 但它的释放高度依赖底层设施。针对东盟内部数字化水平的梯度差异, 应优先支持与柬埔寨、老挝、缅甸等数字基建相对薄弱国家的网络、数据中心、跨境支付与智能物流系统对接, 把成本下降的覆盖面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成熟市场向欠发达市场延伸, 使式(7)中的 $-\sigma\eta_t$ 在更大范围内转化为现实的出口增量。

第二, 推进跨境电商与数字贸易规则衔接, 畅通匹配 - 扩展边际路径。扩展边际的扩大取决于固定进入成本能否真正降低, 而这越来越受制于规则而非技术。应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电子商务专章, 推动数据跨境流动、电子认证、电子发票与跨境支付等规则的协调互认, 降低中小企业进入东盟市场的合规成本与不确定性, 使更多有竞争力的经营主体越过出口门槛。

第三, 以质量升级弥补高附加值环节的竞争劣势。模型表明, 在质量升级渠道弹性不变时, 质量效应随替代弹性增大而增强。应引导出口企业依托大数据洞察与数字化设计、柔性制造提升产品质量与品牌附加值, 重点突破长期承压的高端数字产品领域, 避免出口结构被锁定在低端代工。

第四, 以扩展边际的多元化培育出口韧性, 并防范平台集中风险。出口主体与目的市场的多元化是抵御外部冲击的结构屏障, 应借助数字平台开拓东盟二线城市与中小买家渠道。与此同时, 平台撮合效率的提升本身带有集中化倾向: 流量、数据与结算越向少数头部平台汇聚, 出口企业面对的共同冲击敞口越大, 一旦平台规则调整、支付通道中断或监管转向, 冲击便会沿同一节点传导至大量卖家。对此可从三个层面着手: 在企业层面, 鼓励多平台并行运营与多币种结算, 避免单一渠道依赖; 在产业层面, 支持面向东盟的公共服务平台与出海联盟建设, 为中小企业提供不依附单一商业平台的替代通道; 在规则层面, 推动中国与东盟在平台互操作、数据可携带与跨境支付备份机制上的协调, 降低单点失效的系统性后果。唯有如此, 匹配效率的提高才不会以韧性削弱为代价。

上述四方面并非彼此独立, 而须协同推进。贸易成本下降为更多主体进入市场创造条件, 进入主体增多又拓宽了质量升级与韧性培育的空间; 反之, 若只重基建而轻规则对接, 或只重规模而轻质量与风险, 数字经济的出口红利便难以充分释放。鉴于东盟各国数字化程度差异显著, 政策的关键在于分国别、分环节安排优先顺序: 对成熟市场侧重质量与品牌, 对成长型市场侧重平台匹配与中小企业赋能, 对欠发达市场侧重基础设施与支付物流联通。

6. 结论

本文在垄断竞争与异质性企业框架下, 构建包含质量与贸易成本的局部均衡模型, 系统考察数字经济影响中国向东盟出口绩效的内在机理。模型把数字经济的作用拆解为贸易成本、质量升级与匹配 - 扩展边际三条路径, 并推导出出口额对数字经济水平的弹性表达式。主要结论有三: 其一, 三条路径方向

一致, 净效应恒为正; 其二, 在各渠道弹性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贸易成本效应与质量升级效应随替代弹性增大而增强, 替代弹性较大的产品对数字经济更为敏感; 其三, 扩展边际的扩大不仅提升出口规模, 还通过出口主体与市场的多元化夯实了出口韧性的结构基础。这些结论既为认识中国对东盟出口的结构特点提供统一逻辑, 也指明差异化数字贸易政策的发力点。

本文的分析亦具方法论意义: 把“数字经济促进出口”的总体判断拆解为三条可识别的路径, 意味着政策评价应从关注总量弹性转向关注其内部构成。对中国-东盟这一存在数字化梯度的走廊而言, 辨明各环节究竟由成本、质量还是扩展边际驱动, 比笼统强调“数字赋能”更具操作性。

本文属理论分析, 尚存若干不足, 也提示了后续研究方向。其一, 模型采用局部均衡设定, 把市场支出与价格指数视为给定, 未刻画数字化在一般均衡中的价格与福利反馈。若放开这一约束, 本文结论的方向大体稳健、强度则可能被高估: 数字化推动中国出口扩张会压低东盟进口价格指数, 而该指数下降反过来削弱中国出口品的相对价格优势, 使三条路径的净效应小于局部均衡下的测算; 同时东盟本土企业与第三国出口者的份额调整会带来贸易转移, 各路径相对强弱亦可能重排。不过只要数字化对贸易成本、质量与进入门槛的作用方向不变, 净效应为正的判断不会逆转。其二, 所提命题可利用中国对东盟分行业、分国别的贸易数据作实证检验。其三, 模型尚未考虑东盟各国数字治理规则的差异, 而这很可能是解释双边出口结构的重要变量。

参考文献

- [1] 赖宁菲, 王绍媛, 郑亚松. 数字经济政策如何驱动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机制检验、异质性分析与政策启示[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6, 46(2): 57-73.
- [2] 王茂光, 张建翔.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出口升级——基于珠三角城市的经验证据[J]. 科技管理研究, 2025, 45(19): 96-103.
- [3] 黄晓敏, 梁俊伟. 数字经济能否促进省级出口二元边际扩张[J/OL]. 当代财经, 2025: 1-14. <https://www.cnndoi.org/Resolution/Handler?doi=10.13676/j.cnki.cn36-1030/f.20250723.003>, 2026-09-19.
- [4] 吕美静, 盛斌, 朱鹏洲.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兼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调节作用[J]. 国际经贸探索, 2025, 41(7): 4-19.
- [5] 沈和斌, 张丹宁.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出口扩张的影响研究——基于不确定性的中介效应[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7(3): 47-57.
- [6] 马斌, 何亚男. 贸易摩擦如何影响中国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 基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经验证据[J]. 中国软科学, 2025(3): 214-224.
- [7] 张兵, 宋超凡. 数字经济、要素配置与出口韧性[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2): 161-174.
- [8] 张远鹏, 王超男. 中国对东盟数字产品贸易长期巨额逆差分析[J]. 国际贸易, 2024(8): 65-75.
- [9] Goldfarb, A. and Tucker, C. (2019) Digit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7, 3-43. <https://doi.org/10.1257/jel.20171452>
- [10] Lendle, A., Olarreaga, M., Schropp, S. and Vézina, P. (2016) There Goes Gravity: Ebay and the Death of Distance. *The Economic Journal*, 126, 406-441. <https://doi.org/10.1111/econj.12286>
- [11] Melitz, M.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71, 1695-1725. <https://doi.org/10.1111/1468-0262.00467>.
- [12] Chaney, T. (2008) Distorted Gravity: The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 1707-1721. <https://doi.org/10.1257/aer.98.4.1707>